

概述 · 地域社会

新昌地域社会与宗族文化

陈百刚

一、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

要了解和研究一个地域社会的形成和历史发展，离不开地方文献和文物考古资料，即大史学家王国维先生所说的二重证据。就新昌而言，保存至今的地方性历史文献很有限。《民国新昌县志·艺文》列邑人宋至清代著述书目不过 300 多种，而称得上文献并保存至今不过 10 多种，旧县志保存至今尚存 5 种，内容基本重复，不能说丰富。但是，分散隐蔽地收藏在民间的各姓宗谱，数量就多得不可比拟，真可谓浩如烟海。关于宗谱查阅工作，潘表惠先生独力坚持数十年，做了扎实的基础工作。新县志编纂前后近 10 年，修志同仁又作了更广泛深入的再调查，据不完全统计，已知县内现存宗谱约 150 多部，近 2 000 卷，字数在 3 000 万以上。这些谱书，1/3 为清修，2/3 为民国所修。明以前谱书已不复可见。民间修谱起于宋代，并逐渐形成 30 年一修的传统。据新昌人数众多的几个姓氏历代修谱登记抽样调查，俞氏宋至明合修 15 次，清以后各派分修合计不下 30 次；吕氏合修及分修总计不下 40 次；陈氏均为各派分修，计彩烟陈氏 10 修，上城陈氏 8 修，桂溪陈氏 7 修，梁氏合修 7 次，各派分修不下 20 次；石氏合修 12 次，彩烟丁氏 18 修，杨氏共 25 修，何氏共 26 修，潘氏共 26 修，董氏共 16 修。因此，境内各姓氏历史上总共修过多少谱牒实在说不清楚，要统计其卷册字数，恐怕是一个庞大的天文数字。而已知现存的 150 多部宗谱不过是半

个多世纪几经波劫后的幸存之物而已。

宗谱是什么东西 许多人 特别是年轻一代已茫然无知。国有史 地有志 族有谱。谱书就是一个姓氏、家族的历史 是聚族而居的村落的历史，也是一个地域社会基层单位具体而微的历史。其记载内容主要有 姓氏源流、入迁和分布、人口繁衍、世系承传、人物传赞、墓志、墓葬、诰敕、族规家训、族产、宗祠、里居、古迹、大事、艺文等 可说是以宗族为核心的乡村社会的百科全书。因此 现代国内外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很重视宗谱的整理和研究，纷纷建立研究谱书的学术团体。谱牒学已成为历史学科中一大分支。除了研究地方史志以外 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优生学、人口学、民俗学等等都可从中开采挖掘宝贵的独家资料。谱牒的价值是举世公认的，它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传统和遗产的组成部分。

谱牒起源甚早 古代即有记载姓氏的书 经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 日益发展完备 久传不衰。宋代以后 宗族组织和宗族文化成为涵盖各地域社会全部人口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奇怪的是这种文化现象并没有随着封建制度的消亡下去而衰落，而是随着社会向近代化工业化迈进之际仍然顽强地存在着，更新着。晚清及民国时期 在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江南沿海 宗族文化反而比北方呈现更为发达的势头。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与谱牒文化振兴几乎同时并进。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 寻根意识的增强 历史创造意识也更自觉，谱牒学似乎还获得了新的发展机运。这一现象是令人深思的。笔者在查访宗谱过程中还感受到 与海外不同 大陆的谱书大都散藏于民间，特别是历史文化积淀较深的农村。虽然农民文化不高 多数人读不懂宗谱 也并不了解它的价值 但他们对记述自己祖先业绩的谱书普遍有一种敬畏和神秘的感情，不肯轻易出示 即便通过可信赖者介绍 允许借阅 也常常要有一定的庄重仪式 如洗手、焚香、礼敬等。目前 若干村落及家族 民间自发续修宗谱之风有所回潮 这一点 我们并不提倡 但也并非简单的行政干涉可解决问题 而需要正确引导。其实 这种深深溶化

在民族心灵深处的自我关怀的寻根意识是完全可以转化成自强不息的爱族、爱乡、爱国的一种伟大的精神凝聚力的。

一个地方的文物考古资料也是与宗族文化千丝万缕地联系在一起的。古墓葬中的出土文物差不多都是历代地方上世族豪门代表人物仕宦归乡卒葬于家的殉葬品，如保存在县文物馆中的圣旨、玉带、玉印、六朝青瓷鸡头壶 还有翁仲石兽、御赐神道碑、墓志石等。名园第宅的建造、古籍文献和金石书画的收藏也差不多都是仕宦世家的专利品 前者如醉园半亩塘、朱子著书楼、来青楼、黄氏爱山亭、吕氏皆可园、石氏涉趣园、董氏寿康精舍等 后者如石氏十七帖、朱子手稿、董氏《江山伟观图》、梁氏《云阳招抚图》等。旧县志和宗谱还记载晚清回山梁进士西园家、城中岙桥里吕衷谦家、贤书济美俞鸿逵家、中书第陈恭藻家、旧东门陈荣燮家都曾收藏不少珍本古籍和文物珍品。可惜大部被战火焚毁或流失县外。1958年 新嵊并县 梁进士家近 5 000 多册古籍运往嵊县，迄今一去不返 至为可叹！

以上可称地方文化实物载体 亦属宗族文化遗产 宗谱里都有详尽记载，为文物考古工作提供了研究发掘的线索和依据。

新昌的古建筑遍及城乡。据《民国新昌县志》记载 各主要姓氏有宗祠 500 多座 集中在城里就有 200 多座。以俞、吕、陈、张、潘五姓统计 县内共有宗祠 231 所 在城中就有 109 所。吕氏共 85 所 在城 45 所 陈氏 48 所 在城 27 所 俞氏 47 所 在城 26 所 张氏 31 所 在城 5 所 潘氏 20 所 在城 6 所。当时在县城居住人口约为 3 000 户、10 000 人 差不多 30 户即有一宗祠，分布之密集居浙江全省前列。乡下亦复如此 据《梁氏宗谱》载 彩烟一角 即有梁姓宗祠 89 所；《石氏宗谱》载，沃洲山附近村落就有石姓宗祠 20 所。诚如旧志所言：“衣冠文物 至宋特盛 祠宇坊表 甲于他邑。”全县各类庙宇、路亭、义庵、堤碛、桥梁、古刹 更不可计数。民国县志载有佛寺 34 所、庵 235 所、庙 361 所。这些带有民间信仰和娱乐性质的建筑物，名为村堡所建，实为宗姓独建或联建。庙宇的祭祀

活动 往往与该地某姓为始迁祖 如乡主庙 或民间信仰 如关帝庙、大王庙、禹王庙、胡公庙、真君庙等 相 关 系 宗 族 文 化 的 一 种 衍 生 物。

总之 在新昌地域内 地方历史文化的内涵与宗族分不开 地域社会形成发展也与宗族小社会的形成发展分不开。离开宗族谈地域社会就会空洞无物。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不自量力地 想从宗族文化的清理探索入手，来揭开地域社会发展的历史真相。

二、人口蕃衍迁徙与村落形成分布

新昌人从哪里来？新昌人所聚居的村庄、乡镇、县城如何形成？这二个问题是认识地域社会的起点。

80年代末统计 全县 41 万人 包含 347 个姓氏。其中 13 个姓氏人数各在 10 000 人以上 王姓 41 500 人、张姓 36 000 人、陈姓 30 000 人、俞姓 29 000 人、梁姓 28 000 人、吕姓 23 000 人、潘姓 22 000 人、石姓 19 000 人、杨姓 18 000 人、丁姓 13 000 人、章姓 13 000 人、吴姓 11 000 人、徐姓 11 000 人。这 13 个姓总人数约 30 万 占县总人口 72%。人数在 1 000 至 10 000 人的姓有 25 个，主要有何姓 9 000 人、赵姓 6 500 人、董姓 6 300 人 李姓 6 200 人、胡姓 5 300 人。这 25 个姓总人数约 10 万 占全县 24%。以上两个类型共 38 个姓 总人口占全县 97% 其中列名的 18 个姓氏占全县人数 85%。所以 要了解新昌姓氏与人口的历史情况 抓住 10 多主要姓氏即可把握大局。

从地下发掘墓葬文物获知 两晋以前 新昌已有丁、董、梁、张、黄、王、袁、陈、俞、支等姓居住。但丁氏以外 无谱牒可查 已难寻根。且晋以前新昌尚属草莽奥区，山深林密，地旷人稀，尚未形成地域社会。宋以后，私家修谱兴起，原土著姓氏已与外来人迁姓氏混合，姓氏相同者同修宗谱。所以，探讨新昌人口姓氏来源只好以有据可查的外地人迁姓氏为发端。

历史上姓氏入迁新昌有三次浪潮 两晋、唐末五代、南宋。丁

氏、狄氏、孟氏入迁最早。在东汉、东晋南朝入迁有梁、王、石。隋唐入迁有杨、俞、何、潘、吴、董。五代入迁有黄、陈、胡、张。两宋入迁有吕、刘、章、袁、徐、唐、朱、娄、孙、裘等。民国县志载，清末县内主要姓氏有 55 个。

外来姓氏入迁新昌，其始迁祖卜居之地，基本上也就是早期村落形成之处。查各姓宗谱及《新昌地名志》，可将部分古村落及卜居姓氏开列出来。六朝时已见村有：南洲（丁）、前梁（梁）、槐潭（王）、仙桂、昼锦里（石）、沥江三渡（杨）。还有九峰寺、钟井、孟仓、石城、鼓山、沃洲、岫山等。唐五代已见村有：石牛镇、黄坛（石）、茶亭、查林（梁）、长塘里（杨）、东山（徐）、濼石（徐）、上宅（杨）、下宅（杨）、桂溪（陈）、平湖（陈）、前山根（陈）、前陈（陈）、鹿石（潘）、蔡岙（蔡）、溪西（何）、胡卜（胡）、叠石（吴）、栖霞桥（吴）、白竹唐家洲（唐）、真谿（俞）、五峰（俞）、董村（董）、雪溪（董）、箬。宋代所见村有：三溪、南屏、里王（以上王姓）、元岙、张家店、高礞（以上张姓）、鳌峰、棠墅（以上梁姓）、雪塘里、西山（以上袁姓）、芹塘（董）、泄下（柴）、孙家田（孙）、练吏（戴）、蟠溪（卢）、曹州（曹）、朱岙（娄）、礼泉（赵）、花墙（章）、让里（朱）……大体上说，迟至南宋，新昌境内主要姓氏入迁已经告成，主要村落布局亦基本形成。当然此后村庄还不断增加、扩大、分化，也有少数消亡。其变化概况是：或小村变大村，或一村分数村，或中心村周围衍生若干自然村，或大村发展成集镇。村址的坐落也由风景秀丽、泉甘土肥处向一切适合生存之地发展，并逐步由平地推向山岙。村落发展和布局更新的基本动因，无不与姓氏人口繁生迁徙相关联。姓氏、人口、村庄三者互为表里，其变化沿革有着一定的内在机制。

一村分裂为上下、里外、前后数村。如城郊的上礼泉、下礼泉，上三溪、下三溪，上石演、下石演。东区有前岸、后岸，上百菊、下百菊，外小将、里小将，上朱部、下朱部等。南区有上宅、下宅、中宅，前王、后王，里前丁、外前丁，泄上、泄下，下洲大村、小村等。西区有上山泊、下山泊，上竹潭、下竹潭，里白岩、外白岩，岭头、岭根。

北区有上五峰、下五峰等。

以同一姓氏为主体 随着人口增加 居住地区扩大形成地域成片的连绵村。这种情况可举石氏、梁氏、杨氏为例。石氏居住区以三大片较集中 沃洲片有溪东、溪西、黄坛、青坛、百菊、十字路、茅坪等村 小将片有里外小将、坑里、道士岙、茅洋、埠头等村 石溪片有石溪、下洋、陈岩、八里、石桥头等村。梁氏聚居较集中有鳌峰片 包括大市聚、前梁、后梁、卜坞、外大坑、梁家田、下求、后坑、秀溪等村 彩烟片包括大宅里、中宅、樟花、马家田、王家、上棠、居塘殿、回竹山等村。杨氏则主要集中在彩烟山与天台交界的回山、斋堂、长塘里、后畈、厦里、上市场、茅畈、莲花心等村。

宗亲相连而子孙迁徙后居住分散，形成地域不相连绵但血缘上依然相维系的宗支村。这一类村大体上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因战乱及天灾人祸原因，子孙在劫难中离散，后裔难以连片聚居，如丁、董二姓就存在这种情况。丁姓的宗支村有南洲、茅洋、丁村、丁家坞、柘前、大园、竹潭等村 董姓宗支村有雪溪、芹塘、溪竹、练泗、贤辅、后董、坎头、董家坑等。另一种情况是王、俞、张、陈、吕等人数众多的几个大姓 因人口增加快 幅射力强 迁徙频繁 居住地也遍及县内各区。地名中包含姓氏的村大体上是这些姓氏不断蕃衍迁徙的结果 如与王姓相关的地名有 王泗洲、王家园、王家坪、王家、岭头王、王家庄、王渡溪、王渡里、王渡街、上王、桥头王、王家年、里王、王家岭等。与张姓相关的地名有张家庄、张家店、张家车、上将(张)雅张等。与陈姓相关的村有陈家山、陈家桥、上前陈、下前陈、岭头陈、陈家坞等。当然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口的流动，目前，并非含某姓氏的村全是某姓居民，有的甚至已经不是某姓居住之地了。

姓氏中人迁较迟而始迁祖又为普通平民者，或同姓氏中的衰族弱支往往被挤到比较偏远的山岙定居谋生，从而形成许多小村落。这些村落的命名中也常常包含着姓氏因素。回山片有李间、汤家、袁家、蔡家湾、金家、后谢 儒岙片有朱路、周家、卢家、潘村、

丁年仓、吕家廊、里赵、大市聚、小将片、有葛坞、卜坞、姜家坞、姚家、丁家地、岩头卜、吴家、祝家庙、何家、曹家、孙家坪、鳌坑、彭坑、唐家村、吴家山、李家溪、沙溪片、有上徐、唐家坪、孟家坞、黄坑、竺家坑。

时移世变，姓氏有兴衰更迭，姓氏与所居村落关系也在动态中变化。如儒岙原名徐岙，宋前为徐姓聚居，元朝徐姓被压迫迁入天姥山中，潘姓入迁，世业儒，故改名儒岙。董村始祖为董姓，不久董氏另迁雪溪、芹塘，而俞姓、陈姓先后入迁董村。古村真诏，俞氏、唐氏共居，世为婚姻。700年，二姓均源自山东青州。唐末因黄巢起义，避入剡中。俞氏自五峰而龟溪而真诏，唐氏由剡邑而棠洲而真诏。宋元时，真诏村二、三居处见数家而已，至清末已300余家，俞与唐各得其半。

回山叶家、盛家二村原为石氏所居，石氏绝嗣分别由叶、盛二姓迁入。里屋原名李屋，李姓所居，后为丁姓迁入所居。胡卜、苏秦村，原名为二姓共居之地，后来其中一姓衰亡，地名仍旧。有不少古村现已消失，城郊就有盛岙、蔡岙、钱岙、茭湖等，原因迄今不明。

县治城关镇是众姓杂居处，考察其历史沿革与村落发展过程一致，姓氏入迁，聚落形成，发展连片。县治古名石牛镇，至迟唐代已出现。其先不过星星点点几个聚居小村，如南朝谢灵运投宿处康乐里；此后多姓入迁，分点聚居。唐五代期间，潘姓居城中梅湖，石姓居城西钟楼，何姓居城东何家岐，陈姓居城南前山根，黄姓居北门。宋代聚居点大增，王姓居北门锦村，俞姓居后街，吕姓居城中长墙弄、岙桥里、睦家巷，张姓居张家园，蔡姓居北门塘，盛姓居城南盛桥。县城规模形成，开始分里建坊，有忠信坊、兴贤坊、登俊坊、锦绣坊、拱辰坊、太平坊、仁政坊、应台坊、文林坊等地名出现，明清时规划成六个坊。直至民国期间，各大姓在城中分片聚居情况仍历历可见。这种情况一直到解放后，县城人口猛增，流动加速才完全改变。

综合宗谱有关资料分析 我县的村落 有几个特点。首先从发展沿革看 早期村落出现在水源山麓处 林木葱郁 泉深土肥 而并不集中在平原聚居。原因是始迁祖多为避战乱和慕风景而来，隐逸避世意愿最强 只图生存和安定。而单纯农业社会 人际交往很少 不必多考虑交通。且地旷人稀之时 山腰水畔之地 生态明显较平原为优 同样可发展农耕 故乐而安之。但经济和人口发展的自身规律决定 村落进一步扩大 出现大村、集镇 则必然向三江盆地、交通要道靠拢。再进一步发展 人多地少 则又向深山区开发。其次 从村庄的规模布局看 散乱、密集、数量多、规模小。这很大程度上与新昌百里岩疆、八山半水的自然条件有关。全县行政村 770 多个 而自然村则有 2200 多个，有些自然村又分隔成若干散居点。新昌县人口密度小于市属各兄弟县，而村落数量则远远超过兄弟县。这说明人口聚居状态还保留着自然性和原始性，阻碍社会进步和生产发展，也不利基层社会的整合和公共事业的发展。再次 从村庄的自身发育看，一直处于低层次阶段 聚族而居 宗缘关系强固 村际间孤立、封闭 经济交往稀少 地缘凝聚力不强。小村变大村 大村变集镇的进展趋势非常缓慢。相反 许多自然村和民居点 忽兴忽衰 聚合无常 若有若无 游移不定。村之命名以自然界山水岩林为依据的多 如东山、南山、岭等、溪下、泄上、岩泉等等 以历史文化为内涵而命名的村少 也说明村庄的原始性。许多村名在口口相传中一变再变 本义难明 如沥江三渡 又叫田平、殿前、田前等 下潘又名鹿石 燕窝又名花墙 平水庙原名栖霞桥 大明寺原名高桂等等。地名的不规范也说明村一级地域文化传承上的混乱和中断。

从姓氏蕃衍看人口，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是发展不平衡性。最早入迁的丁、狄、孟、杨各姓 人数已远远被后人迁的王、张、俞、吕、陈超过了。4 个古姓中 丁、杨已属次一级大姓 狄姓已绝 孟姓已很少。陈姓宗支多，不通谱。已知县内陈氏 5 系 最迟入迁一系为上城陈氏 阴初才从嵊县迁入新昌 人数却远远超过早入迁的

4 系。梁氏在南宋初即分查林、鳌峰、彩烟三派。彩烟梁氏人口最发 超过查林、鳌峰 2 支梁氏人口之和；而生存环境彩烟并不比查林、鳌峰优越。

其次，发展不平衡性引起我们对各姓人口兴衰原因的思索。从外部原因说，生存条件和自然环境的优劣，天灾人祸、疫病战乱等不同遭遇都起着作用。而更重要的可能是内在机制。凡兴旺发达的强宗大族和房派均有其地位、财产上的优势，又有门当户对的婚姻优势和仕宦世家多妻多子的生育优势，还有宗族文化、教育公益、道德伦理上的优势 使其世泽绵长 芳声久远 人丁兴旺。当然也不可能常盛不衰。在新昌，有声望的世族高门代有更迭：宋代为石、王、梁、黄 明代为吕、俞、杨、潘 清代则有陈、张兴起 清末及民国 新人迁的强宗 俗称马、董、言、高。

再次，各姓氏入迁后基本上在县内安守家园，流动性不大，少数宗支在邻近县之间迁徙。外迁较远的只有极少数出仕和谪居人物。太平天国起义后，人口流动加快，并出现新情况。民初统计，外出到沪、杭、甬及下三府经商、做工、垦耕、育蚕者 已逾万人。在县内，各村富户、能者有向县城和较大集镇迁居的趋向。血缘连绵村、宗支村受到冲击，但亦远未瓦解。

三、地域经济的开发

宗族蕃衍，村落聚居形成，为谋生存发展，第一要义自然是开垦土地，整治田园。世代代生息劳动，一片片荒原成为沃野，一座座荒山成为梯田梯地。劳动改变着新昌大自然的面貌。宗谱里对始迁祖创业之艰辛多有记载：“丁崇仁治装去剡城，逾沃洲至菩峰之麓而居，名其地曰南洲。厥时 山高水深 地僻人稀 虎狼交迹 辟基拓楹 掘井开田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南洲爱得我所矣”（丁氏）“荣王逊荒 抵沥江而居 由唐武经始 六传之后 田宅始丰”（杨氏）彩烟梁氏 南宋时迁居棠墅 其时该地半属荒墟 岗陵

骈秀 两溪夹前 是曰万家地。数世后 沃野平环。历千年 人烟弥望 梁氏居地近百村 人口逾万。“始迁祖卢允迪 宋时避金兵之乱 乘楫南游，达新昌彩烟蟠溪，四顾川峦毓秀，即卜居此地。时其地尚属荒墟 经历几代人整治开垦 遂成沃土（卢氏）”五世孙赵祚 明洪武间 当玉山之东、彩烟之西、三洲之下、夹溪之上 诛剪荆棘 辟斯原地 将近 500 年（赵氏）又 明清鼎革之际“大雷庄田百数十亩尽荒芜。赵执广招贫民赔银设厂出口粮之费、开种之本，不数十年成沃土（赵氏）”始祖必芳公 明初自台迁澄潭钱王井头。家境清寒 时值隆冬 清早上岭头上砍樵 此地皆是丛林蔓草，见大黄金树，挂饭包于树上。砍樵至正午就餐，饭包尚温，又见其地钟灵毓秀 以为有吉兆 遂立志迁居。嘱其子曰：‘汝辈要克苦耐劳 披星戴月 创立家业 岭根必为我发族之地。’子孙在岭根安家，披种植诸书 仿陶猗之法 芝种稜 植楠榴 种茶桑等皆收其利 以故田园广置，炳于一时”（顾氏）。以上都是各宗姓始迁祖筭路篮缕 以启山林的故事 宗谱中屡见不鲜。

新昌多山 耕地不足 历来缺粮 饥荒时现 势必扩大耕作 不断向山地进军；同时，因地制宜，不断开拓新的种植内容。烟茶桑木之类土特产因此逐渐发展起来，成为新昌农业一大特色，并成为目前开发农业、治穷致富的滥觞。这类资料，宗谱虽所载不多不全 但一鳞半爪 也可窥见其中消息。“山居农民以烟叶为生 亲赴产地购油饼 发展烟叶种植 低价贷诸族人”（沃洲石圭峰）“人生在世以不能自力生产为可耻 乃取蚕桑、畜牧、树艺、货殖诸书悉心研究 以其所得 改习农商 口齿日繁而应付裕如（查林石钜卿）”“善于垦拓山地种植茶叶 年获利百余金，十余年间成富室（西岭赵能培）”“喜畜蜂 置蜂房凭檐列 如南面百城（彩烟陈光乐）”“乡人鬻兰蕙者莫敢与陈君较长论短。客有购兰蕙者皆来定价于陈（城中陈之商）”清初 有人游此地 梅林山石承美之园地），喜其地灵 肯以 10 亩田易之 曰 吾若此地果树艺 吾子孙岂但 10 亩而已（梅林山石承美）”舌耕难以持家 弃觚学稼 青山可艺，

植仙草而葱茂；绿水作甘，贮醴泉之芳冽。土石皆藏金之穴，邱壑悉取宝之场（梁祖廉）晚清梁西园筑别业于韩妃下洲“取张氏弃地种桑、树果、栽竹成美观而得地利……后见米珠腾贵种桑植果犹不足尽地利，遂于冬日招韩妃、下洲两村之贫乏者 200 余人砍桑移果掘山之土以取泥扛鼎之石以筑堤亲自指挥数历寒暑欹斜成平地去沙砾而成淤田。”石祥彬、吕德杨、盛邦玉等邀集同志“开发东区荒沙以益地方生产邑人至今称道不衰。”明清二代，新昌籍到贵州独山任知府的俞汝本、到广东雷州任知县的陈九级、到湖北天门任知县的梁葆仁，他们都曾在任官之地传播新昌经验“种桑养蚕、劈山开田”从而造福当地名列志书受到歌颂。

与开发土地、多种经营的同时，农业基础设施也随之改进，主要是交通和水利。较大型的工程如东堤、城墙、官道等多为政府倡导，乡宦组织，民间出力协同完成。但在古代，一个县域之内大工程是极少的，而大量的都是民间自办的小工程。交通方面主要是路、亭、桥、渡水利方面主要是碛、堤、塘、井。而这些生产和生活所必需的种种设施，基本上是宗族作为慈善事业和公益义举承担下来的，这类资料在宗谱和旧志里俯拾皆是。如董遂良，“北宋祥符间在南岩寺筑董公塘三口护田，大雷庄水口造石桥”；清有陈之昊“义举多在桑梓割腴田于桥渡利兼徒扛舆梁修数百里崎岖之路大道悉康庄。”陈家鳌、陈文炤父子在北区“召集农工兴修水利，数百亩粮田得免水患”。石绍协等，清嘉庆间督功倡修题岩碛、章家碛石蕴斋民国期间在茅洋溪谋筑伐道炸去溪中巨石，水道大畅，货出如流。这类人物，每一宗族每个时期都有。记载在民国县志内的交通水利设施名目繁多，计有岭路 100 多条桥渡 140 多处水井池塘 80 多处堤碛 140 多处茶亭 34 处……其中小部分在命名上就已标出与宗姓关系如潘家桥、丁公桥、梁家桥、王氏义井、潘氏义井、陈家井、张家井、孟家井、董公塘、郡马池等。其余部分若与宗谱对照，也多与宗族乡绅公益义举相关。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新昌的路多沿山而建，因此又称岭：会墅岭、关岭、撞潭

岭、石蟹岭、韩妃岭、练使岭、镜岭、陈公岭、松木岭、剡界岭、败兵岭、天烛岭、朱母岭、寨岭……到处是岭 崎岖高峻 狭如羊肠 有的既是通道，又属村落地名。岭路上布满施茶歇息、躲风避雨的凉亭、义庵、土地庙、泗洲堂之类十分简陋的建筑物。这种现象也可说是新昌的一种奇观和特产，其实它是和宗族发展、村落增加、人口不断向山区拥入、农耕不断向高处开发联系在一起。人住到哪里，土地开垦到哪里，岭路也修筑到哪里。新昌人求生之艰辛，开拓精神之顽强，于此可见契机。新编县志对此作了如下概述：“新昌山水清奇而农耕条件不佳。地貌陡峭不平，水流短促湍急，土质瘠薄少肥。不生嘉谷，不产鲜肥，无鱼盐舟楫之利，财赋岁入不及上县十之一二，素称地瘠民贫。在这块美丽而贫瘠的土地上，新昌人民世代代胼手胝足，付出了艰辛而顽强的劳动。百尺梯田 农人耕于天际 鸟道盘桓 岭路通向山巅 为其真实写照。”

在土质瘠薄的山区过度地开垦 必然导致生态上失衡 但这一趋势在新昌不算太明显。新昌优美的自然风光和良好生态环境至少到清中晚期还未完全破坏，这从宗谱里许多歌颂本村风光的“十景、八景”诗中可见；从村老回忆祖辈生存环境和幼时耳闻目睹可知；从民国时期地方土产中依然以竹木柴炭为大宗亦可说明。新昌自然生态之美一直被人们看作“仙源”之地而无限向往，随手举些宗谱对村居环境的描绘。

彩烟 土厚水深 生物茂美 松杉郁罗 幽雅峻绝 遽然如与世隔。

天姥：秋阳不碎空翠影，绝壑倒泻银河声。青冥楼阁仙人家，三生凡骨不得到。

儒岙 全村人住玉清天 那言鸡犬不神仙。尘埃飞不到 环山白云封。

鳌峰 形胜镇东都 溪山似锦铺 梅多甲九州 美景一悬泓。

查林 渔郎过滩 金鳞逐浪 鸥鹭四起 沽酒忘机。

东山石磁 不计年华乔木高 鹊巢构遍断鸱号。苍松突兀占岗

峦 隐谷瀑布好寻奇。

真诰：百花香里看春耕，环村布谷催桑馆。小桥明月羨鱼情，桑麻鸡犬呈繁广。

醴泉 五马山下独秀 流泉归田 掬而饮之 甘若醴。

元 岙龟峰 春日妍 柳眠桃浪 好鸟和鸣 夏日爽 岚锁霞蒸 景风徐起 秋日幽 雁字横天 菊葩傲月 冬日洁 雪瓣装崖 梅芳拂神。真四时皆图画。溪流清莹光澈，鱼儿须眉可数。长松磊落，苍苔古厚 天籁清风与流波唱和 不复作人世想。

环境确实优美，关键在保护森林和涵养水源。山间林木荫翳，明清尚存 故宗谱中常有虎豹出没的记载：“明初 梁氏宗人于苏村连日获五虎。”清初 后岱山赵氏一支列强公 随父进山遇虎 父大窘 公即搏虎驱救。”明时 陈抒信夜视父墓 时山中多虎 猎者伏弩于径者三 公往来践踏其间 弩皆不发。”据此可知当时原生林尚存。

保护森林、维持生态之功应归宗族。各宗族的族规家法与当时村规乡约一致严禁滥伐山林，对村前屋后的水口树、风景树、祖茔上的荫木保护尤力，违者要受严厉处罚。如吕氏家范规定“清明祭祖墓 毕 遍视庵舍山木田地 有毁失者 以时究理。”石氏族规有“盗砍坟荫 永不准复族”的规定。卢氏则以“不登山而网禽鸟 不临水而毒鱼虾”作为道德信念。

从宗谱资料看，较大规模的商品贸易和近代工商企业的产生要到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此前，商品经济水平很低，基本停留在古老的墟市、草市交易阶段。

明代有两位世家出身的读书人最先对商业有兴趣，一位是明初吕不用之弟吕九成的子孙“以贾请 猷 指吕九成）曰：不可，此事最坏人心术。”商店终未开成。另一位叫潘律，与县城世家布政俞铎、廉宪吕昌友善 明成化二年（1466），馀姚商人王金三到新昌开市，潘律为其作招子（广告之类）以招之。早期农村集市的形成也有宗姓介入，如清康熙间回山做市，梁姓开市于陈龙山，今王家

村附近,汀姓开市于下畈,今白皇殿附近。二姓互有矛盾,经县令棠公调解断案,俱定为二、七开市,一个叫上市场,一个叫下市场,已废。事实上,宗族文化意识,一贯重农轻商,成为市场形成和发展的一种阻力。

早期外出经商发家的人物,可举几位代表。梁奎誉,“明万历壬子(1612)山阴(稽)大饥,贩粟山阴利济桥,见饥民塞巷,遂以所发之粟赈饥。”其后裔梁舜康、梁宏纲等“服贾苏杭,财源渐蓄,造屋买田。”又梁昌渊、梁余森父子,进士梁葆仁之祖及父。经商恒远出浙越苏扬,广收见闻,积阅历为学问。“清康乾间,彩烟陈君瑞经商湖海、南北二京,友辈无不亲悦。”中书第宁远祠陈瑑(1744-1816)“善治生,得白圭人弃我取之术,广置田宅,有田千余亩,捐田修宗祠,助科举。”早期商界人物大都个别经营,尚无组织。资财积累远胜农耕,但大都用于买田造屋,或造福桑梓,极少扩大再生产。观念上儒商气味很浓,仍寄希望于后裔读书出仕。比较值得注意的是沃洲石绪境(1768-1836)、石静谦(1792-1867)父子。“尝以商南走闽粤,西及宜昌,北抵徐州”;远销大宗土产,商务最盛,获利颇厚;家邻多竹,设厂造纸,运销北客,世守其业。石氏当为早期试图用土特产打开销路并积资办企业寻找致富道路的近代型先进人物。早期地方工业情况,宗谱中仅见查林“顾东陶冶”一例,诗曰:“黑烟红火满天空,铁斗铜浆功业丰。夜半窗前偷剩烛,依稀星月色如虹。”制陶冶金已具一定规模。又有能工巧匠赵贤昌“弃学就工,以养八口之家。习蔑业,剖竹为筐,花样生新,蔑丝组字,笔墨无异。”当为我县竹编工艺业先声。

太平天国运动后,情况变化,国内洋务自强呼声高涨。农民运动打击了封建地主势力,投资土地积极性下降。观念亦趋更新,“天壤间唯土农工商四条正路”。除外出经商外,就地开店、办厂,风气渐开。不少宗族世家,太平军离乱之后,家道中落,或业贾市廛,或服贾远方,或服畴异域,住居星散,糊口他邦。如董氏“迁绍始祖童桂元,元泰定间(1324-1327)任会稽教谕,十六世孙董世美、

童绍泰来新经商 遂家焉 为邑望族。”

晚清民初，宗族大户在县内设肆办厂可开列一串名单：石劫夫（1880 - 1940）开设“石同丰”茧行于梅鹤西山，又与嵊县俞丹屏合力开设道益银行于杭州，嵊县设分行；陈于洲（1822 - 1889）以善酿造酒治生，财日裕，陈锡蕃（1869 - 1933）弃儒经商，酿酒起家，造酒之精，城中无出其右者，鬻财数十年，贵雄于邑；陈福堂（1859 - 1932）创办斐章染织厂，石圭峰避洪杨之乱，由下洋迁居城中，与伯兄合设笥肆，兼营铜锡业，又采购油饼，低价货族人，石珽丰，15岁入城习经商事，22岁开设“协泰”号为新邑贸易重点；石祥楸（1861 - 1935）初肆工，嗣为贾，继设“同春”号，与邑绅吕皆三等创立县商会，推为会董；俞文辘（1886 - 1931）曾赴杭司艺，返新筹建布厂，又任平民习艺所所长，实开我邑实业之先河；桂溪陈瑞轩、澄潭陈昆源学商镜岭肆，在黄婆滩通竹筏，筑廛舍，商贾聚会，数年得厚资，陈驾霄在城中槐巷口设“永源”号。以大宗土产烟茶丝术营销外地的主要商人有后岱山赵和钱，彩烟赵秋芳，桂溪陈裕隆、陈曙春、陈国芳，城中陈于泮，兰沿陈燮堂等。在外地办企业的有陈则忠（1901 - 1943）抵沪经商，驰誉商场，石丰衣，习西医，设友谊药厂于杭州，石履江，创办桑隐庐于杭州，石志德，发明有声电影放映机，并设厂于上海……

总之，在新昌地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在向生产广度深度进展过程中，随处可见宗族的力量和影响。

四、乡村基层社会的整合

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漫长，统治制度特别完备，社会结构特别稳固；因此，史学界有“中国封建社会具有超稳定结构，长期停滞不前”的论说。笔者认为：这里面重要秘密之一是宗族组织和宗族文化在起作用。在古代，县以下就是基层社会，朝廷派遣官吏只到达县一级为止。广大乡村社会都属民间社会。朝廷和地方政府通过